

# “树人”著《玻璃神》作者考

## —树人是否是鲁迅—

松冈俊裕作 松冈俊裕、刘畅译

树人著《玻璃神》，原名为《寓言小说玻璃神》，刊登于民国初年的《中华小说界》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1914年11月）。

《中华小说界》是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月创办的月刊。在当时的上海，与中华书局相匹敌的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早已出版了月刊《小说月报》。后来（1921年）《小说月报》改组，成为了号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并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与此相反，《中华小说界》出完第三卷第六期（1916年6月）就停刊了。这也是《中华小说界》从前几乎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原因之一。

虽说《玻璃神》是树人“著”，但其实上是根据了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作家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 1802~1827）的童话集《斯培萨餐厅》（Das Wirtshaus Spessart, 1828）中《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写成的。豪夫童话集中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数人交替讲故事的长篇形式构成的。《冷酷的心》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

豪夫是格林兄弟之后德国又一著名童话家，除《斯培萨餐厅》之外，他还留下了《队商》，《亚历山大里亚长老与奴隶们》两册童话集。高桥健二认为，“《冷酷的心》是豪夫童话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杰作，（中略）他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幸福，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昭和二十九年，创元社出版《世界少年少女文学全集》十四《德国篇一》解说。）在我国（日本），自大正十五年藤井昭翻译《冷酷的心》以来，已出版多个译本。

《玻璃神》可谓《冷酷的心》的再现。虽然故事梗概大体一致，但其中也不乏若干区别。“豪夫的童话是浪漫的，空想的，但同时也是十分写实的。”（前述高桥健二文）《冷酷的心》中写实性的描写细致入微，而《玻璃神》则将内容大幅压缩，描写更为简洁。不仅如此，《玻璃神》在压缩内容的同时，还进行了修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冷酷的心》中，主人公彼得打死新妻里斯培特的情节，被改成了单身的彼得犯下弑母大罪。《玻璃神》比起原著来，可以说是带有训诫性较强的成人童话。

且不论原作与改编的《玻璃神》有哪些异同之处，单说署名“树人”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因“鲁迅”这个笔名而广为人知的周树人。鲁迅1881年生于浙江省绍兴，是周家的长子。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树人”是1898年18岁的鲁迅入学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之际，由该学堂国文教授，周家族人周椒文所赠。顺便要提的是，鲁迅二弟作人，三弟建人的名字也应当是拜其所赠。周氏三兄弟的名字都是培养人才之意。树人取自“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篇》）。

众所周知，鲁迅于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有关这之前的鲁迅的事迹，近年来的资料发掘与研究进展的确填补了很多空白。然而却依旧还有诸多未解之谜。已知的鲁迅早年文学活动大致如下：

1902年至1909年，日本留学期间的鲁迅通过日文和德文接触欧洲文学和思想。其成果之一便是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编或是改作（见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简）。这一点和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

中的三篇（鲁迅翻译的有迦尔洵的《四日》，安德列耶夫的《漫》、《默》）所表现的翻译态度迥然不同。

在回国担任故乡绍兴的师范学堂校长一职时，鲁迅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1911），这也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直到后来的《狂人日记》，此间鲁迅没有创作过任何小说。但正如鲁迅所说，当时他通晓德文，对童话和佛教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在留日期间关注基督教。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玻璃神》的作者“树人”为周树人，即后来鲁迅的概率极大。

鲁迅在1913年发表了《拟播步美术意见书》（署名周树人）。其中，倡导将童话作为国民文学之一加以研究的主张也是他关心童话的一个证据。此外，在《玻璃神》发表的1914年，鲁迅基本上潜心于佛经的搜集和佛教的研究，其成果之一便是同年9月编纂，翌年（1915）1月翻刻完成的《百喻经》。从《百喻经》的翻刻可知鲁迅关心的核心是佛教中的大乘佛教。而这与《玻璃神》作者的大乘佛教观不谋而合，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顺便要提一下，体现出对佛教关心的是结尾处“树人氏曰”以下的部分。这其实是沿袭了传统的论赞形式。该形式始见于司马迁著《史记》各列传结尾处的评语“太史公曰”。在《柳毅传》等唐代传奇（文言短篇小说）中的数篇也有作者的评语。此后，清代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在各篇末尾也可见“异史氏曰”的评语。

1906年二弟周作人在一度返乡的鲁迅的陪同下，东渡日本。此后，两人同心协力从事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与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工作，试图启发中国民众的觉醒，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前面提到过的《域外小说集》就是其最初的成果。1911年辛亥革命后，鲁迅去往北京，周作人留在绍兴，两人虽然身处异地，但兄弟感情却亲密依旧。例如前面所提的《怀旧》就是由周作人加上题目，并以自己的笔名“周遑”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期（1913年4月）。鲁迅编纂的《会稽郡故事杂集》（1915年2月）也是以周作人的名义发表的。

发表《玻璃神》的《中华小说报》里还在第一卷第二期（1914年2月）、第一卷第七期（同年7月）、第一卷第十期（同年10月）分别登载了周作人的《艺文杂话》、《江村夜话》、《希腊拟曲》。因此，不排除《玻璃神》实为周作人所作的可能性。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周作人本人对童话的关心程度是要甚于其兄的事实。原文中的“先令”、“磅”等英国货币单位出现在一个以德国童话为蓝本的作品中，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太自然。这应该是谙熟英文的周作人依据了《冷酷的心》英译本（比如“The Cold Heart”, tr. by J. Oxenford & C. A. Feiling, 1844）的缘故。非常遗憾，笔者无暇参看各英译本，因此如果哪一本中出现了上述的修改的话，那么这本就是笔者所指的版本。《玻璃神》的作者问题也就不得不重新考察了。

辛亥革命之际，周作人写下了《望越篇》，抒发了自己对革命前景的深重忧虑。在袁世凯残酷统治下的1914年，他写下小说《江村夜话》，一吐自己的绝望之情。另一方面，鲁迅也作为领导人之一参加了绍兴的革命运动，至晚在1915年陷入绝望，开始拓本搜集前，他表面上还是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说，在1914年创作《玻璃神》之时，鲁迅还没有对革命的前途及民众的觉醒感到完全的绝望。这本《玻璃神》中的体现的训诫性则更像是属于鲁迅的东西。

笔者为调查《中华小说界》登载的一篇周作人的《艺文杂话》，浏览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该杂志之时，由于机缘巧合，偶然得知了树人著《玻璃神》的存在。随着对《玻璃神》这个新资料研究的深入，笔者对周氏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有了重新的认识。

最后，关于豪夫的问题，笔者承蒙北海道大学副教授（写作本文时）青柳谦二，助手（写作本文时）高桥吉文，研究生（写作本文时）伊藤祐纪子的指教，在此附记，深表谢意。

（信州大学 学術研究院 総合人間科学系 教授）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 文学研究科 修士課程1年）  
2015年1月20日受理 2015年2月28日採録決定